

特征·缘由·启示：中国现代化试步阶段之评说

On the Initial Stag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吴忠民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提 要 1949~1978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特征是经济不规则的高速增长(高速、低效、产业结构不合理、个人收入增长率低、起伏波动大)。其它特征包括:社会分化相对不足;教育发展迟缓;开放程度小且摇摆度大;社会稳定,社会问题少,社会控制能力强。强化的政治运动和空前的社会动员是上述特征的主要根源。空前的社会动员推动了经济增长,却忽视了效率和个人利益。必须明确经济建设是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应当采用有效发展模式取代高速增长模式。

大致地说,1949~1978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试步时期。这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这一时期,人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行为带有一种明显的探索的色彩,现代化模式尚未被确定下来;具体发展战略的改换也过于频繁,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的摇摆度比较大。

这一试步时期在中国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一方面,它为后来的现代化阶段奠定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也为后来的现代化阶段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教训。

一

中国现代化进程在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在于,经济现代化建设不规则的高速度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实力的高速增长。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为1 015亿元,国民收入为589亿元,1978年则分别增至6 846亿元和3 0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及国民收入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8年分别为726.3和453.4。按可比价格计算,1953~1978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为7.9%,国民收入增长率为6.0%,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0%。可见,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在这一时期确居世

界的前列。

第二,发展过程中的低效性。综观这30年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是靠外延型的发展方式而非内涵型的发展方式推进的,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发展过程中的低效性。例如,全民所有制单位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逐渐减少:“一五”和“二五”时期均为29.4元;1963~1965年为16.5元;“三五”时期为18.9元;“四五”时期为18.7元;“五五”时期为15.5元。

第三,产业结构很不合理。这集中表现在农轻重关系的严重失调。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把发展工业的重点放在重工业的建设上是有道理的。只有将重工业基础打牢,方可有效地装备农业和轻工业,带动农业和轻工业的现代化。但是,就我国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的具体进程而言,无论是从基本建设的投资来看,还是从增长速度来看,农轻重三者的比例过分悬殊。重工业比重过大,必定会导致大幅度减少农业和轻工业赖以发展的资金,从而使农业和轻工业不能得以顺利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重工业本身的结构也不合理,属于自我服务型结构。重工业对于农业和轻工业没有起到应有的带动作用。

第四,个人经济收入增长率过低。全部职工平均工资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了1978年,实际工资指数只有110.3。

第五,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的高反差起伏。

回观这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着明显的起伏性,而且,这种起伏表现为一种比较固定的轮回周期,即:高速增长→经济滑坡、善后处理→再高速增长→再经济滑坡、再善后处理……。

这一时期经济不规则的高速增长这一突出特征,对于当时乃至以后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

中国的现代化在试步时期除了具有经济不规则高速推进这一突出特征之外,还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1. 社会分化相对不足

所谓社会分化,一般是指社会机体本身伴随着经济现代化过程的推进而日益形成众多的差异或专门化的社会分工。任何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必然地会出现社会分化现象,尽管在时间上可能有迟早之分。

相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中国在这30年的社会分化无论是就其程度还是就其速度而言,都是不足的。

社会成员的分化度很小。当时,社会群体非常简单,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群体内部构成的同质性(单一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社会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简单性。简单的社会群体直接规定了社会成员分化的不足。社会成员的位置具有不变性和固定性的特征,个人的选择余地很小。同时,个人的收入非常相似。

区域分化也明显表现出相对不足。就一般情形而言,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前期阶段,区域分化趋势比较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区域在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增大,也表现在不同区域中的个人收入之间差异的增大。到现代化的中期阶段,由于社会流动程度的增大,各区域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有可能开始减小,但各区域作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其差异仍难以消失。中国在这30年当中的实际情况则很特殊。区域之间的界限比较分明,但各区域的自主权却比较小,上一级权力机构对所辖区域统得过死。这就造成区域分化的相对不足,使本来具有一定潜力的区域得不到应有的充分发展。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区域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基本上没有拉开;另一方面,在名区域之间,作为个人收入重要表现的个人消费之间的差距也比较小。

2. 现代知识和教育发展相对迟缓

现代知识和教育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知识和教育还是现代化

进程的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现代知识和教育的发展更为重要,否则,无法形成有效的再创造能力,甚至无法形成有效的汲取能力。

应当承认,在这30年,中国的现代知识及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技术及教育的体系;培养了大批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社会成员;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不能否认,同经济高速度的发展相比,中国的现代知识和教育的发展是相对迟缓的,而且,存在着不少问题。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于现代知识和教育的总投入相对不足。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很低,而且,略呈减小的趋势:1952年为1.87%,1955年为2.41%,1960年为4.14%,1965年为2.85%,1970年为1.43%,1975年为2.64%,1978年为3.12%。

第二,现代知识和教育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平均每万名职工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在1952年为269人,1960年为390.4人,1978年为593.3人。就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而言,增长率是比较低的,而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则基本上是负增长的状态。

3. 开放的低限度进行,而且摇摆度过大

对于任何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而言,开放既是一种必要的前提条件,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各个国家之间,甚至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开放的具体模式之间可能会有些差异,不宜一概而论。

在50年代,中国的开放可以说是一面倒,开放的重点放在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对于西方国家,则基本上是形成了封闭的态势。当时,苏联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推进方式,苏联模式的痕迹随处可见。就是在直接引进方面,苏联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大的,同苏联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几乎每年都占了中国全部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一半左右。

在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开放过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边倒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中国的开放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中断了。深闭固拒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色。7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国的开放虽然在参照借鉴方面做得依然不够,但在直接引入方面开始较大幅度的增强。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例,1970年为45.9亿美元,1978年则增至206.4亿美元。

4. 社会的相对稳定

就通常情形而言,现代化的前期阶段是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这时,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错综复杂,造成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过度城市

化、贫富差距悬殊、失业现象突出、社会失范、犯罪率急剧上升等等,进而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同许多国家的这一时期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试步阶段并未造成过多的社会问题,因而1966年前,社会是相对稳定的,这也同中国在经济方面的高起伏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十年动乱时期,社会显然是处在动荡状态之中,但究其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现代化过程本身造成的。

中国在1966年以前社会的相对稳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社会问题的种类较少,其危害程度也较低,不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许多在别的国家曾出现过的社会问题,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并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虽然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某些不正常的现象,但很快被消除,因而没有造成过度城市化问题。中国没有出现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各个阶层收入的差距是在不断地缩小。中国不存在严重的失业现象,如1978年,中国城镇待业率只有5.3%。另外,当时从总体上看,中国也并不存在着社会失范及高犯罪率问题。人口问题的酝酿虽然始自这一时期,但对当时来说,尚未形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二,社会具有高强度的控制能力,可以有效地化解异常性的变故,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值得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相对稳定具有着明显的时代性。对于以后来说,很难具有重复性。

三

同许多国家现代化的前期阶段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在试步时期具有很不相同之处。一个重要的根源在于,总的看来,在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并没有占据时代的中心位置,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政治运动则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的中心任务。现代化建设在相当程度上从属于后者。

这一时期,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现代化的重要性,并视之为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政治运动逐渐频繁、升级和强化,以至逐渐成为实际上的中心任务。1956年中国确实将现代化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内容,但时隔不长这一局面便告结束。

也正因为如此,日益强化的政治运动对于中国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经济发展战略的频繁改换。不断地强化政治运动,势必会更加不遵循经济建设本身的规律,使经济发展战略从属于政治运动,因而经济发展战略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而不断地频繁改换。

本来,经济发展战略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确实也应不断更新。问题在于,这种更新应当是新旧战略之间的相互衔接,是新战略对于旧战略的进一步补充。由是观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在这一时期的频繁改换是不恰当的,因而难免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第二,在所有制方面不切实际地追求高纯度。当时,人们往往容易将所有制的变更视为目的,而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视为从属性的东西,认为只要所有制有所进步,那么,社会生产力也必然会随之发展,生产的规模会扩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会提高。于是,符合逻辑的结果是人们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即社会主义所有制所包括的范围越大越好,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

第三,把现代化建设主要限制在经济和自然科学与技术的领域。当时,人们实际上是将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等同起来。过多的政治运动,很容易使人们形成这样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是,中国的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非经济领域无疑是先进的,因而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另一个观念是,既然中国是先进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社会科学也就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这样需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只限于自然科学与技术。重要的是,人们把这两个带有明显偏颇性的观念直接用来指导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这就必然会对现代化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

既然过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对于现代化建设有着如此深远的影响,这就不能不使中国现代化在试步时期形成一些明显的特点。经济发展战略的频繁改换,势必会造成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大的摇摆度;对于所有制一大二公的过度要求,又必然会进一步要求不切实际的大规模生产,追求高速度,从而忽略了经济效益问题;另外,还会忽略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正常分化问题。将现代化建设限于经济领域和自然科学与技术的作法,势必会使非经济领域如教育、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滞后,并进而又连锁产生其他一系列影响。

四

空前的社会动员,是中国这一时期现代化进程诸项特征得以形成的另一重要根源。

所谓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特定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

1949~1978年,中国社会动员的范围之大,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的。

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空前的社会动员,决非出于偶然因素,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及社会原因的。其一,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统一。经过几代

人的奋斗,中国终于获得了独立,获得了统一。中国民众由此形成了一种激昂的民族自豪感。其二,社会的重构。在50年代前期,中国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重构工程,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了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私有制,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于是,人民大众积极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浪潮之中。其三,民族解放运动的惯性。民族解放运动所具有的特性并没有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而即刻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历史惯性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新中国社会动力的一个重要源头。其四,国际上的压力。在50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严峻对峙;到60年代,则是中苏、中美之间的对立。严峻的国际形势,不能不使中国民众的民族整体感特别地突出出来。总之,在这种条件下,当时的中国人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这就使当时空前的社会动员成为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毕竟还不是现实,尚需要进一步的转换方能成为现实。而在当时,又恰恰存在着有助于这种转换的两大杠杆。一个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毛泽东的崇高的地位和威望,而且,毛泽东又特别地重视精神意识的作用,偏爱群众运动。另一个则是中央集权体制。中央对于各区域、各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极为有效。号召人物的威望和形像与执行系统的严密有效,最终使空前的社会动员在当时成为一种现实。

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涉及范围广泛。当时,几乎在所有的领域如政治、经济、知识等领域都曾进行过社会动员。其二,规模大,程度高。许多次社会动员,几乎都是全民动员、全国动员。其三,持续时间长。从1949~1978年的30年间,社会动员几乎没有中断过,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状态。其四,总体上的可控性。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有时过于情绪化,而难以控制,但总的来看,还是具有秩序性、可控性的。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是空前的,可以说达到了极限化的程度。这就势必会对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空前的社会动员是中国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动力。在社会动员中,社会成员的主体能力能够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及资金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投入的劳动量越大,所得到的产出也就越大。而在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意味着空前的劳动量的投入,因而经济的现代化便获得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在空前的社会动员中,人们的道德取向、价值取向、信仰以及行为方式很容易溶为一体,所以这时社会成员相对以往来说不会非常看

重个人收入的增长问题,不会过多地考虑个人的生活问题。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资金的高积累。而高积累又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进行的重要原因。

空前的社会动员很容易造成经济效益的相对低下。在大规模社会动员中,人们往往是靠劳动投入的总量来取得较高的产值。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社会成员并不很重视劳动生产率,并不很重视技术的革新,以及自身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提高,于是平均单位时间的产值便很难为人们所看重。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产值提高的幅度远远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难理解经济效益为什么一直是相对低下的。

如果把握不当,大规模社会动员还容易增大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摇摆度。在现代化的前期阶段,发展基数比较小,如果成倍地增加劳动的投入量,发展的结果很容易明显增大。在中国现代化的试步时期,恰恰属于这种情况,因而很容易使人们头脑发热,将发展的指标定得过高。不切实际地追求发展的高速度,过于脱离国情,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经济发展过大的摇摆。

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只要没有失去控制,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全社会的有效动员,意味着社会向心力、凝聚力的高度激发,意味着社会中异质成分的减少,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共识容易形成。所以,社会问题得以产生的机会就被减少了。

关于这一时期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还有一点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就其趋势而言,它逐渐与政治运动合流。于是,这就从两个方面对于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化进程本身的推动力量开始减弱;另一方面,则是同政治运动互感、互诱,社会动员被滥用,以至于最终失去了控制,两者共同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从而直接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甚至在某个时期使现代化进程中断下来。

五

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30年间存在着不少问题,尽管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所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是必须看到,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1978年末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何才能顺利地推进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使之健康地展开,而尽可能地少走弯路?这方面,中国在试步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中所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必须使现代化建设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历史已充分说明,频繁的、以阶

级斗争为纲一类的政治运动对于现代化建设只能起一种阻碍或是歪曲的作用。而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因为如此,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宣告,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标志着历史的巨人转折。这一转折确实来之不易。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人们的观念和实际行为,真正实现这一转折,使现代化建设真正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时代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否则,现代化建设仍有可能无法正常、顺利地进行。

第二,用有效发展模式来取代高速增长模式。中国现代化在试步时期的30年间,是采取了经济高速增长模式,极力追求产值的迅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模式存在着许多弊端。它直接造成了发展的低效性;加深了经济增长与非经济因素发展之间的脱节;加剧了环境污染;增大了发展进程的摇摆度。而且,这一模式有着一定的极限。即使现在想继续奉行这一模式,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种高速增长模式所赖以存在的前提在于过度的高积累、劳动的高投入,而现在,过度的高积累由于人们消费需求的增大而很难做到了;至于劳动的高投入,由于过去的那种高强度社会动员已不存在,所以也许投入的劳动力数量不算少,但劳动的强度则明显的减弱了。由此可见,必须改换这种高速增长的模式。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取而代之的应为何种模式呢?毫无疑问,应是有效发展模式。有效发展模式旨在建立起促进内在生长系统,注重发展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之间的共生性以及发展推进的有效性,注重发展结果的较高效率和较好的效益。总之,唯有有效发展模式,方可成功地推进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正确地组织和使用社会动员。社会动员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怎样组织并使用社会动员,会对现代化整个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化试步时期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其一,社会动员必须同现代化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社会动员方可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否则,如果社会动员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不相一致,那么,只能构成现代化进程中的排斥力量,从而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其二,必须“适度”地启动和使用社会动员。空前的、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方能形成。而这种特定历史条件往往不具有重复性。另外,社会动员有着自己特定的规律和周期性。当一次社会动员的高潮过去之后,往往需要缓一段时间,社会动员方能够重新酝酿形成。因此,不宜在任何时期在任何问题上都一

味地追求高强度的社会动员。而且,对于社会动员的运用一定要得当,而不能滥用,否则,非但会造成一种浪费,还极有可能对于现代化进程直接造成许多不利的影响。

(责任编辑 孙立明)

(上接第23页)

资源被破坏的后果重视不够,以及由于环保的开展较晚,所以环境污染在某些地区比较严重,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受破坏的程度也比较大;

3. 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的工业发展较快,但环境污染也较严重;有些地区的工业发展缓慢或者说,仍处于刚开始起步的阶段,相对而言,那里的生态状况还比较好;

4. 生态农业的发展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生态农业村和生态农业户的数量都非常小;

5. 我国的资金供给仍是相当紧张的,对资金的需求量大,资金供给不足,而当前急需投资的部门很多,如何合理地分配有限的资金成为一个难题。

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实中选择可行的、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途径时不得不考虑的基本条件。符合实际的选择将是上述三种方式的配合。

第一种方式,不宜被我们确定为指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但问题在于,国内某些地区(例如珠江三角洲、上海及苏南地区、某些大工业基地和工业城市)实际上已经自发地走上了这条发展道路。可供我们选择的办法只能是:一方面赶快采取措施治理环境,减少并逐渐消除因工业发展,环境污染而引起的损失,另一方面,要大力防止新污染源的出现,防止对生态环境的新的破坏。

第二种方式,可以在象海南岛、青海、西藏这样一些生态环境至今尚未遭到较大破坏的地区采用,今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可以“边发展经济,边治理环境”。

第三种方式,具有较大的适用性。不管是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还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不管当地的农业是集约经营的还是粗放经营的,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都是必要的,而且也有可行性。至于发展环保产业(尤其是广义的),对每一个地区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认为,在三种可能方式的配合中,应以第三种方式为主,前两种解决方式为辅,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效益型经济发展道路。这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必须作出的选择。

(责任编辑 冷远猷)